

思想史中的稀有者，他的魅力在于越老越激进

罗斯巴德传

An Enemy of the State: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美〕贾斯廷·雷蒙多 著

朱海就 主译

政府干预越多，市场调节就越慢，经济萧条就越漫长，危害就越大，经济复苏就越困难。

Murray N. Rothbard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罗斯巴德传

〔美〕贾斯廷·雷蒙多 著

朱海就 何雪凝 吴未 译

JUSTIN RAIMONDO
An Enemy of the State: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斯巴德传 / (美) 贾斯廷·雷蒙多 (Justin Raimondo)
著; 朱海就, 何雪凝, 吴未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2019

书名原文: An Enemy of the State: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ISBN 978-7-5520-2585-9

I. ①罗… II. ①贾… ②朱… ③何… ④吴… III. ①默
里·罗斯巴德—传记 IV. ①K83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3045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本书版权、文本、宣传等事宜, 请联系: qmbys@qq.com

An Enemy of the State: The Life of Murray N. Rothbard.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0. Copyright © 2000 by Justin Raimondo.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rometheus Book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8-1210

罗斯巴德传

著 者: [美] 贾斯廷·雷蒙多

译 者: 朱海就 何雪凝 吴 未

责任编辑: 周洁磊

出 版 人: 余 凌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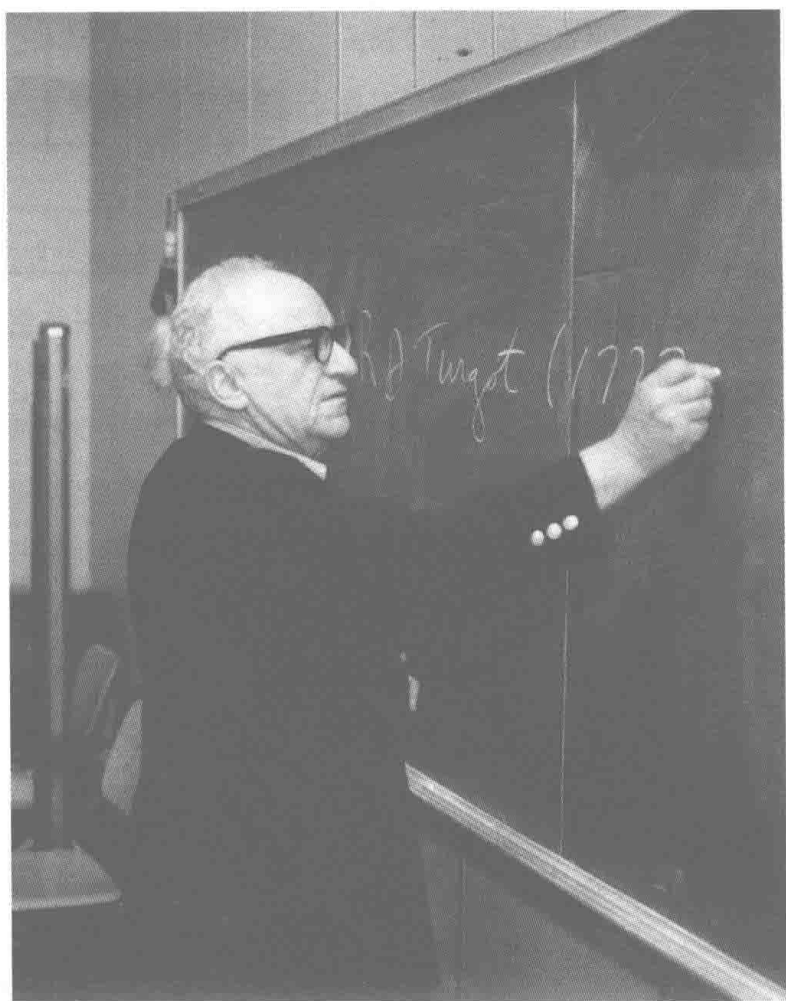
印 张: 12 插 页: 3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585-9/K · 491

定价: 7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 90 年代的罗斯巴德

罗斯巴德生平概要

- 1926年3月2日 出生于纽约一个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
- 1942年 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数学与经济,1945年获本科学位,1946年获硕士学位,1956年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1819年大恐慌:应对与政策》
- 1948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与乔安·舒马赫相遇,1953年结婚,相守终身
- 1949年 与米塞斯相识,之后加入其研讨班,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传人
- 1952年 开始撰写《人、经济与国家》,1962年出版。这部著作被视为米塞斯《人的行为》的解释版
- 1954年 结识安·兰德,很快分道扬镳
- 1963年 出版《美国大萧条》,从奥派理论视角解释经济危机
- 1965年 撰写《捍卫极端先验论》,扛起了米塞斯行为学方法的大旗
- 1965年 与卡尔·赫斯合作创办《左与右: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期刊》,与新左派结盟
- 1973年 加入自由意志党,1976年创办自由意志主义研究中心,1977年创办《自由意志主义研究期刊》,1989年脱离该党
- 1982年 与他人共同创办米塞斯研究所;代表作《自由的伦理》出版
- 1987年 创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后更名《奥地利经济学派季刊》
- 1992年 “思想的儿子”、同事罗伊·柴尔兹去世,他深受打击
- 1994年 罗克福德研究所颁发英格索尔奖给他,以表彰他的“作品确立了西方文明的根本原则”
- 1995年1月7日 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曼哈顿去世,葬于弗吉尼亚州奥兰治县的橡树公墓

出版说明

默里·罗斯巴德是美国战后重要的理论家,被认为是米塞斯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同时又自成一家,是自由意志主义(又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思潮的理论导师。

罗斯巴德知识极为渊博,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诸多专业有很高的造诣。他著述繁多,成就卓著,尤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独树一帜。罗斯巴德企图打通各学科疆界,建构体系庞大的“自由的科学”。他见解独到,逻辑性强,词锋犀利,思想颇具魅力,因此他的追随者不少,而且经久不衰。在中国学术界,关注他,引用他的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罗斯巴德对社会现象、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功能有深刻的洞察,敏锐地揭示了政府的本性,探明了人、市场、政府的关系。他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视角梳理经济史,特别是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史,可谓别开生面,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他对美国大萧条的分析至今是这个领域重要的成果。他的经济学理论承前启后,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丰富了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罗斯巴德与米塞斯、安·兰德等人共同构成了美国右翼思想谱系,但是他的思想走得更远,更彻底,进而提出“无政资”的主张,应者颇众。与米塞斯相比,他没有那么沉重的历史负担(或者说是与旧时代的渊源);与安·兰德相比,他没有那么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感悟。罗斯巴德博览群书,熟谙文献,长于分析,善辩好斗,热衷政治,参与社会。既是典型的书斋学者和沙龙思想家,也是一名活跃的“行动者”。罗斯巴德具有非常典型的犹太激进知识分子特征,阅读他的作品令人感到他与他所批判的对象之间存在同质关系。他的许多观点过于偏激,甚至非常极端。他对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不加区分,一概彻底否定,落入无政府主义的窠臼。同时极度崇尚个人价值、推崇自由意志,否定集体的力量和作用,主张极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怀有严重的偏见。他维护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种种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同意、不能接受的,希望广大读者以批判的眼光、正确的态度看待罗斯巴德的观点。

罗斯巴德的著作已经有不少译成中文出版,但关于他的传记在中文世界一直空缺。本书是第一本罗斯巴德传记,因其著述严谨,材料详实,学术价值较高,汉语学界一直期盼中文版面世。经译者、编校者、出版社及启蒙编译所一起努力,默契协作,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译事不易,岂敢自信;疏漏之处,切望读者不吝指正。

献给安部义则 (Yoshinori Abe)

致 谢

本书面世得益于许多人的宝贵协助,尤其是默里的夫人乔安·罗斯巴德,她的合作对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至关重要。我们做过4天的马拉松式访谈,她给了我本书的框架,还有完成写作的激励和精神支持。

我要感谢米塞斯研究所所长小卢埃林·H. 罗克韦尔(Llewellyn H. Rockwell Jr.)。他不仅许可我引用罗斯巴德的信件和未出版手稿,还在这个项目的研究阶段给予了宝贵的帮助。我还想感谢研究所全体成员,尤其是杰夫·塔克(Jeff Tucker)和朱迪·汤姆森(Judy Thommesen),他们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照片资料。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马迪(Mardie)那非凡的友善。

罗伯特·凯普哈特(Robert Kephart)允许我查阅罗斯巴德的一大批未出版信件和手稿,还有其他相关物件,在此我深表感谢。他是罗斯巴德的挚友,也是自由的挚友。

我尤其要感谢拉尔夫·雷克(Ralph Raico)通读本书手稿,并提出富有洞见的建议。

我非常感激威廉森·埃弗斯(Williamson Evers),他让我查阅了他收藏的罗斯巴德信件等相关文档。

我也要感谢阿尼塔·安德森(Anita Anderson)为我提供住处,感谢杰弗里·罗杰斯·哈梅尔(Jeffrey Rogers Hummel)将他收藏的部分自由意志主义刊物供我查阅。

我尤其要感谢普罗米修斯书屋主编史蒂芬·L. 米切尔(Steven L. Mitchell),感谢他对本书的信任。

上述人士均对本项目的完成有巨大贡献。不过,那位付出最多的人的名字写在本书献辞页。

尽管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不可能写成本书,但除了我本人之外,上述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需为本书内容负责。

目 录

致 谢	1
引 言	1
第一章 青年罗斯巴德	13
第二章 老右派的背水一战	48
第三章 三段交往：米塞斯、巴克利和兰德	81
第四章 超越左与右	138
第五章 蒙哥马利街 1700 号	198
第六章 新的开始	244
第七章 顶点	292
第八章 遗产	353
译名对照表	366
译后记	371

引言

用一句话、一本书概括一个普通人的生平与工作并不容易，即使一部传记相当详尽，也无法完整把握一个稀松平常的人物的复杂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总结写了 28 本书、上千篇论文的罗斯巴德的生平与工作呢？更何况，他的一整套理论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不仅囊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还涉及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包罗万象的社会思想。

人类错综复杂、神秘多样，其个性和动机被层层包裹起来，以至于我们很难看清其实质。这是传记作家所面对的问题。不过，有极少数人终生秉承一种风格，有着内在一致且看似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让他从一开始就迥异于人，而有着清晰的目的感。这种风格是创新头脑的标志，是一切领域的思想家、艺术家、理论家、改革家的标志，他们不是片面地反抗现有秩序，而是同时提出自己对理想秩序的看法。简而言之，他们体现了阿克顿勋爵笔下古典自由主义者富有活力的精神：“展望应然，忽略实然。”¹

如果要找一句格言概括罗斯巴德的心境，那么阿克顿勋爵

这句话便是了。这种年轻的精神是我们理解他的人格和观念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是他的生平和工作的主旋律,蕴藏在他的风格和他的思想方法中,也在他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论文《左与右:自由的前景》结尾处点明了。他大段引用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伟大记者、美国自由主义的良心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话作为结论:

年轻人无休无止地质疑一切老而确定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当他们听到辩护者含糊其词的答复,他们会用自己的血肉和理性精神来检讨这些制度和观念,发现它们是愚蠢的、空洞的、有害的,然后出于本能将它们推翻。²

新鲜、纯净的理性探究精神,根据新证据反复检验旧观念、挑战最根本的假设的精神,即是罗斯巴德本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也总能产生有争议的结果。他敢问不可问的问题:国家——有什么用呢?他的回答:毫无用处。

“年轻人就好比酵母,让所有质疑和检验的态度在世界中发酵。”伯恩写道。“发酵”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罗斯巴德对新一代自由运动的影响,多年来这场运动都处在表面之下,几乎是由罗斯巴德独力产生的一种地下热能。“要是年轻人不再找麻烦,”伯恩继续写道,“要是他们对烦冗的诡辩和注释不再厌恶,要是他们不再坚持事物的本然面目,社会就会直接走向腐朽、死亡。”³

罗斯巴德的思想奥德赛的历程——从老右派到新左派再回到老右派——正是这种“找麻烦”的活动。用“找麻烦”来形容

罗斯巴德的活动再贴切不过了,他不仅找各类国家主义者的麻烦,甚至他最亲密的盟友也未能幸免。撇开这些关系波动中的个人恩怨不谈,罗斯巴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不断根据经验检验自己从逻辑中推演出来的理论,不断磨砺和完善自由的理论,随着局势推移而改变战术。罗斯巴德是那种罕见的人,集理论家与思想企业家于一身。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推崇自由意志主义的加图研究所内部圈子写过一篇篇幅的备忘录(所以从未出版),其中讲述了“企业家式的战术灵活性”的重要性,指出了他所说的“思想企业家”的关键角色。“正因为企业家精神归根结底是一门艺术而非生搬硬套就可以学会的科学,所以意识形态战术,即在正确的时机发现正确的路线,也是一种企业家艺术。而在这个领域,有的人会比其他人更为擅长。”罗斯巴德在手稿《走向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变迁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Libertarian Social Change”)中写道。“[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洞察到时机把握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这种精神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⁴

罗斯巴德身后的传记作家有丰富的材料可以利用,他不仅就广泛多样的主题写过论著,还留下了大量的通信。要是打算追踪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尤其是政治思想),还有额外的宝库可以动用,也就是《左与右》《自由意志主义论坛》以及《罗斯巴德-罗克韦尔报告》等报刊中罗斯巴德的著述。只要见过他在报纸杂志上的高产程度,就不难确信他曾经多么成功地将思想企业家的原理付诸实践。在各个关键的时刻,在国家权力的思想爪牙难以驾驭群众、体系出现裂缝的时刻,我们总能见到罗斯

巴德的分析,看到他在策划如何扩大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保守主义运动日益面临来自“新右派”的攻击(包括其鼓吹者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及前托派理论家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他们无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信条直言不讳),罗斯巴德捍卫了保守主义运动的遗产,这些遗产曾经令像约翰·T.弗林(John T. Flynn)、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和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Colonel Robert McCormick)这些反对罗斯福新政和参战的老右派“孤立主义者”感到无比光荣。罗斯巴德创办《左与右》这份刊登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和分析评论的季刊的时候,正值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无法取胜又道义尽失,也正当20世纪60年代第一波学生反叛运动席卷全国大学校园。对于年轻人的不满浪潮,他没有主动迎合他们的偏见,而是小心翼翼、绘声绘色地解释了他们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来源于集权化的国家安全机器的暴政,它渗透到了大学,慢慢将大学揽入怀中。早在新左派不复流行以前,罗斯巴德就将目光转向了巩固20世纪60年代的战果,将其转化为一场目标一致、学理独立的运动,而且要有自己的组织和建制。随着冷战结束,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预言^①(即计划

① 这是米塞斯在1921年的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的预言。尤里·马尔采夫(Yuri Maltsev)在该文章1991年版的序言中也指明,计划经济是“一个空想计划,其核心不合逻辑、不经济,也不切实际”,因为“它不给经济计算的客观基础提供任何方法,从而无法将资源配置到最有生产力的用途”(http://www.mises.org/Econcalc/FOREWORD.asp)。——原书

经济必然崩溃)成真,罗斯巴德又作了一个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归他青年时代的老右派。

带着伯恩笔下那种年轻人的不耐烦,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闯劲,罗斯巴德不断挑战常规思维,而不论这属于谁的地盘。他最爱的莫过于将骷髅从最深、最暗的橱柜里揪出,用新的事实和新的看待权力的视角来修正官方版本的历史。他尤为懊恼的是发现 20 世纪两场世界大战被各种谎言所包裹。战争是国家强制力所崇拜的神明,而反战恰恰是罗斯巴德哲学的核心,一直处在其意识形态-政治议题的首位。作为世界大战修正史观大师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支持者,他为庆祝巴恩斯教授荣休的纪念文集供稿,文中指出“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可以扮演也一直在历史中扮演两种相互排斥的角色:或是独立的真理寻求者,或是宫廷的宠儿”。“御用历史学家”是巴恩斯造的词语,而罗斯巴德将这个概念扩大为“御用文人”,他们粉饰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掠夺、压迫和凶杀行为,“从而换得财富、权力与声望”,即讨好“国家及其同盟的当权派”。⁵

要说有谁是御用文人的对立面,那个人非默里·牛顿·罗斯巴德莫属。他撰写的两卷本权威巨著《经济学思想史》让人不禁要问:他怎能如此博学?毕竟,他只是在一所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工科院校做了 35 年教师。⁶但看似不起眼的工作并不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和产出丰厚、文笔非凡的作家。不过,他从学术和写作中取得的收入依然让日子有些捉襟见肘。

伯恩还讲到了一点,能让人强烈地回想起罗斯巴德的心理:“我们的长辈,对现状总是十分乐观,对未来十分悲观;年轻人

则对现状悲观,对未来充满希望。正是这份希望在撬动进步——也许可以说它是进步的唯一杠杆。”尽管第二种情绪确切地表达了罗斯巴德的看法,但是伯恩指出这种乐观主义“可能覆盖很大的范围”。尽管罗斯巴德显然相信18世纪自由主义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但他在《左与右》这篇论文中警告读者,既然人生来具备自由意志,那么,简单地站在真理和正确的一边,或者是等着国家主义危机降临到我们头上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完全揭露国家作为致命的寄生虫的一面,而这就需要有正确的领导——敏锐地把握时机的思想企业家。他在思想上由衷地忠于自由意志主义原则,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项更罕见的品质,也就是罗斯巴德所说的“对正义的热情”。

在为加图研究所领导层写的一份从未出版的战略备忘录中,罗斯巴德直抒胸臆,也发泄了他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不满。在这份备忘录中,罗斯巴德强调将自由的胜利作为目标是重中之重。“这看似不言自明,”他写道,又长叹一声表达了自己愤怒的疑惑,“如果胜利不是最终目标,为什么还要费力气加入一个目标永远实现不了的运动呢?”此外他还注意到,有的人“更多是把自由意志理想当成是智力游戏”,有的人则被“深刻的悲观主义”所感染,本就认为运动不可能胜利。“只有那些受对正义的热情的激发和塑造而形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人,才有可能将自由的胜利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他们意识到国家主义是非正义的,他们渴望尽快消除这种刺眼的非正义。”⁷

正是这种热情鼓舞着罗斯巴德。这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还是一个他深切感受到的个人信条。他的热情也鼓舞了很多